



# 弗兰克·奈特文集

卷一

SELECTED ESSAYS BY FRANK H. KNIGHT:  
*"what Is Truth" in Economics?*

## 经济学的真理

[美] 弗兰克·奈特 著

[美] Ross B. Emmett 主编

王去非 王文玉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经济思想译丛

---

# 弗兰克·奈特文集

---

卷 一

SELECTED ESSAYS BY FRANK H. KNIGHT:  
*"what Is Truth" in Economics?*

## 经济学的真理

[美] 弗兰克·奈特 著

[美] Ross B. Emmett 主编

王去非 王文玉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经济学的真理 / (美) 弗兰克·H. 奈特著; 王去非, 王文玉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6. 12

书名原文: Selected Essays By Frank H. Knight:  
“what is truth” in Economics

ISBN 978-7-308-16219-7

I. ①经… II. ①弗… ②王… ③王… III. ①经济学  
IV. ①F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10041 号

## 经济学的真理

[美] 弗兰克·H. 奈特 著 王去非 王文玉 译

---

责任编辑 叶 敏

营销编辑 杨 硕

责任校对 周红聪

封面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148号 邮政编码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35mm×965mm 1/16

印 张 27

字 数 388千

版 印 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6219-7

定 价 78.00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中心联系方式: (0571) 88925591; <http://zjdxcbbs.tmall.com>

## 绪论

弗兰克·哈尼曼·奈特 (Frank Hyneman Knight, 1885—1972) 是两次世界大战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最有影响力的学者” (Stigler, 1987: 56), 是他那一代人中最重要、最重要的非凯恩斯主义美国经济学家。他在 1928 年至 1945 年间与维纳 (Jacob Viner) 作为《政治经济学杂志》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的共同主编, 在 1950 年当选美国经济协会 (AEA, the American Economic Association) 主席, 并于 1957 年被美国经济学协会授予弗朗西斯·沃克奖 (Francis Walker Medal)。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创立之前, 这个奖项每 5 年评选一次, 且仅授予为经济理论作出杰出贡献的美国经济学家, 是美国经济学界的最高荣誉。1959 年, 美国商会 (The United States Chamber of Commerce) 授予他“在世的最伟大美国人奖” (Great Living American Awards), 美国学术团体协会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于 1961 年因他为人文主义学术作出的杰出贡献而给予奖励。此外, 作为美国艺术与科学学院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 院士和意大利国家荣誉学院 (Italian national honorary Accademia Nazionale Dei Lincei) 院士的奈特, 于 1965 年入选斐陶斐荣誉学会会员 (Phi Beta Kappa, 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组织, 成立于 1776 年)。他还被多所欧洲和北美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 其中包括格拉斯哥大学 (1951)、普林斯顿大

## 2 经济学的真理

学（1946）、西北大学、哥伦比亚大学（1954）和罗切斯特大学（1963）。

viii 奈特出生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的麦克林县，他的父亲是个农民，把农活看得比教育重要，但在宗教信仰方面比较宽容。由于家里缺少劳动力，奈特没有完成高中教育，但他仍在 20 岁那年进入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一个位于田纳西州的，在神学方面比较保守的小学院就读。随着 1908 年美国大学的关闭，奈特转入到密立根学院（Milligan College），并于 1911 年毕业。此后，他在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essee）学习的两年里取得了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之后，他进入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攻读博士学位。虽然奈特的最初兴趣是哲学，其次才是政治学和经济学，但他最终转向了经济学，并有幸师从阿尔文·约翰逊（Alvin Johnson）和阿林·扬（Allyn Young）。期初，奈特在约翰逊的建议下围绕利润理论选择了博士论文题目；但在约翰逊离开康奈尔大学并担任《新共和》（*New Republic*）的编辑后，奈特在扬的指导下于 1916 年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成本、价值和利润（*Cost, Value, and Profit*）”，并在 1917 年的“哈特，沙弗纳马克思”（*Hart, Schaffner, and Marx*）经济论文竞赛中获得二等奖。1921 年，这篇论文以我们今天熟悉的书名《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出版。

奈特第一次进入芝加哥大学是在他完成博士论文后不久，他被聘任为 1917—1919 学年的经济学讲师。此后，未能在人才济济的芝加哥大学经济系谋得终身职位的奈特，于 1919 年在爱荷华大学经济系稳定下来，并在此后 8 年期间跻身于同时代顶尖经济学家行列。20 世纪 20 年代末，虽然有多所大学向他发出邀请，他还是在 1928 年选择重回芝加哥大学，并在那里待到职业生涯结束。20 世纪 40 年代，他在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且在哲学界取得了可与其在经济学

界匹敌的威望。与他不断扩展的角色定位一致，奈特在芝加哥大学的职位也被重新规划：他于1942年被多门社会科学任命为教授，并于1945年被任命为哲学教授。虽然奈特于1952年正式退休，但他继续在芝加哥大学担任经济学及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直到60年代。晚年的奈特经常在其他大学巡回演讲，其中，1958年在弗吉尼亚大学演讲的系列讲稿是其最后一部著作——《认知力与社会民主行动》（*Intelligence and Democratic Action*）（1960）的基础。此外，他终身坚持写作——奈特最后一篇论文发表于他逝世后的1973年，他还留下了一篇未完成论文（“论亚当·斯密的利润概念”）和一部未完成著作（详见由Emmett编写的即将出版的完整书目）。

奈特对经济理论最大的贡献来自于以书名《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1921a）出版的博士论文。在这本著作中，他出色地概括了新古典经济理论，引入了其著名的关于风险与不确定性的区分，认为在不确定情形下企业家行为便是利润来源，并ix 指出了社会科学知识的根本局限性。《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展示的分析风格被后世称为奈特主义分析风格：他不作仅限于理论假设范围的经济学研究，同时将狭窄的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扩展到现代自由社会的困境研究领域。这本书还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发展先驱之作，因为其中还包括了决策理论、不完全竞争理论、常与伦敦经济学派联系着的机会成本理论和以市场失灵为基础的厂商理论。此外，奈特对经济学的重要贡献还包括对马歇尔成本理论进行了更清晰的阐述（1921a）、先于科斯对庇古社会成本理论进行的批判（本书第4章），以及对奥地利资本理论的批判（本书第9章和第12章）和对斯拉斯基-希克斯（Slusky-Hicks）需求理论的批判（详见即将出版的本书姊妹篇《奈特文集》，第二卷，《自由放任：支持或反对》，第8章）等，这些均成为芝加哥价值理论的基础。

在奈特看来，他的理论对部分“常识”起到了进一步的阐

#### 4 经济学的真理

明的作用，这与他对其经济学的技术贡献是同等重要的。他认为，经济学家对社会的重要性不表现在对经济理论的不断提炼，而表现在如何在现代自由主义的困境中，对经济知识的关联性和局限性做出明确的判断。奈特对科学方法在人类和社会研究中的应用持谨慎态度，怀疑社会控制的潜力，公然反对那些“浪漫地”渴望用道德解决大规模社会问题的人。他一再强调，世界中不存在令社会科学和政策成功的不二法则，只有关于“我们是谁”和“我们想到哪里去”的艰难交谈。奈特在美国经济协会主席演讲中引用塔列朗（Talleyrand）的名言，即“唯一的好原则是没有原则”。稍后，他修改补充说：“正确的原则是尊重所有的原则，把它们都充分考虑进去，然后用好的判断力决定在某一情况中遵循哪一个或多个原则”（第二卷，第12章）。

x 从奈特给自己设定的大量的研究任务可以看出，他在作为系统的理论学家的同时，更是一位出色的批判家。对于经常重复出现在他的著作中的一些主题，在具体的争论背景下，他总是对他人的论点带着批判性的评价。这一批判姿态在奈特的众多书评中是表现得很明显的（这一卷里有7篇），不过，无论是否明显，他的大多数论文是在评价他人为社会理论化建立系统性基础的尝试。值得注意的是，奈特参与的重要争论常常无关乎经济；他与哲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自然科学家和其他专门科学家的争论即便不是更加重要的，至少也同等重要。

此前出版过的三本奈特文集（1935a、1947和1956）均是在他在世时，由他的学生结集出版的，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奈特参与的部分重要争论，尤其是关于经济理论和方法、自由主义哲学和社会主义问题的争论，他在这些领域的著作也将被收入本书。此外，为了让读者更全面地理解奈特，我们也努力把他在其他争论中发表过的、在其他文集中没有收录的文章收入本书，其中包括：关于资本的争论；在芝加哥大学持续了10年的

关于西方哲学教规、现代科学和高等教育之间关系的争论；以及他努力表明自己不同于同时代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和哈耶克（F. A. Hayek）等作家在自由社会地位上的观点。这些将有助于那些对奈特的著作感兴趣的人全面理解奈特的思想。虽然编者难以在两卷文集里呈现他发表的所有 130 多篇文章和更多较短的书评，我们仍认为本书收录的 29 篇文章是具有充分代表性的。其中，6 篇来自 19 世纪 20 年代；8 篇来自 30 年代；10 篇来自 40 年代；3 篇来自 50 年代；2 篇来自 60 年代。本书主要按照时间顺序进行编排。

本卷的第一篇论文是“科学方法在经济学中的局限性”（简称“局限性”），它发表于 1924 年，比排在其后的第二篇论文“伦理学与经济解释”晚两年，这意味着该篇论文没有按时间顺序进行编排。这样的编排是因为“局限性”是奈特与同时代学者关于“制度主义”争论的最早期论文成果。20 世纪初，美国xi经济学界对“新古典经济学”既强调抽象理论分析，又强调自由企业制度的社会优越性感到不满，这迫使他们寻找“新古典经济学”的新范式。《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就是其中的典型：它指出以“完全竞争”概念为基础的理论分析是十分有限的，“控制问题”才是现实生活中的工业资本主义的中心议题。不过，奈特的分析仍然是站在以 J.B. 克拉克（J.B. Clark）为代表的竞争市场理论的基础上的，而制度主义者试图寻找一个替代传统理论的，更具动态分析能力的框架。这一框架将能够更好地解释经济关系的调整。

在 1917 年至 1919 年间，芝加哥大学为奈特、J.M. 克拉克和一些年轻的社会科学家提供了讨论“制度主义”的机会。当奈特和克拉克参加 1920 年美国经济协会举办的关于“传统经济理论（Traditional Economic Theory）”的分会时，这些有关制度主义的讨论上升为全国性的经济讨论（克拉克，1921；奈特，



1921b)。在随后的第二年分会上，塔格韦尔（Rexford Tugwell）将主要讨论者的相关论文编辑成论文集，并取名为“年轻一代宣言（manifesto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塔格韦尔，1924：ix），这似乎在为“科学”经济学的来临而欢呼。

“局限性”是奈特提交给“年轻一代宣言”的论文，是他对《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中的方法论的扩展研究。这篇论文显示出了奈特对制度主义的矛盾态度。一方面，他同意制度主义者关于“传统经济理论的静态本质限制了其对当前社会政策研究的贡献”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不同意制度主义者以科学为基础重建经济理论的观点。“理解和控制人类行为从根本上区别于解释和利用物质世界”（第38页），因此社会政策问题永远无法以科学为基础。在塔格韦尔编辑的论文集中，奈特对“新经济学”的批判十分引人注目并得到广泛关注。如同阿林·扬的评述：“奈特教授的文章……能给任何著作添加个性”（扬，1925：156）。

xii 在“局限性”论文之后，奈特在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期间又写了几篇批判制度主义经济学的文章，其中包括“经济心理学的事实与形而上学”（第5章）和“新经济学和经济活动的控制”（第8章）等文章。前一篇文章比“局限性”一文更详细地研究了行为心理学及其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值得注意的是，由经济学家奈特撰写的“经济心理学的事实与形而上学”是有关心理学的专业研究，这似乎在提醒我们20世纪20年代时的学科分界并不像之后那么清晰。后一篇文章是对萨姆纳·斯利克特（Sumner Slichter）的教科书《现代经济社会》（*Modern Economic Society*）的书评合集，其中第一篇书评被收录进了本文集，展现了奈特深刻分析中夹带辛辣讽刺的写作特征。

奈特的“伦理学与经济解释”和“竞争的伦理学”（第2章和第3章）来源于他1922年在哈佛大学进行的两次讲座。这两

篇文章最初是分开发表的，但于1935年被合在一起作为《竞争的伦理学和其他论文》（奈特，1935a）的开篇。在这两篇文章里，奈特更着重于对“科学经济学”和自由企业制度的伦理性批判，减少了对“科学经济学”的科学基础的逻辑性批判。他的批判既针对新兴的“科学经济学”，也针对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的自由企业制度——指出了“科学经济学”和自由企业制度均存在剥去人类行为伦理内容的问题——他既彻底摧毁了制度主义寻求通过社会控制来实现社会改良的想法，也致命地批判了自由企业制度的“伦理首要性”这一传统经济学信条。其中，奈特对自由企业制度的批判十分有力，使得帕廷金（Don Patinkin）把“竞争的伦理学”的第二部分描述为“经济学有史以来最彻底的批判文章”（帕廷金，1981：36）。

在奈特对制度主义的批判中，他的核心主张是“确切定义的传统经济理论是科学的，应该认同其在社会政策讨论中的重要但有限的作用”，他的很多文章都例证了这一主张。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社会成本解释中的一些谬误”（简称“谬误”，第4章）。奈特首先研究了格雷厄姆（F. D. Graham）如何用报酬递增理论批判国际贸易理论，然后把论述引向社会成本问题和用政府调控来改善自由市场产出的讨论。奈特还拓展了阿林·扬（1913）对庇古的关于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之间关系的批判，保护传统经济理论免遭受那些滥用报酬递增和社会成本概念的人的攻击。今天，“谬误”一文作为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1960）的著名文章“社会成本问题”的先驱之作而著称。科斯的xiii文章为芝加哥法学和经济学传统奠定了基础，从而常常被解读为对市场关系的一种辩护。不过，“谬误”的目的主要是弄清楚庇古和格雷厄姆分析中的理论混淆，也为今后讨论自由企业制度的真正缺陷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基础。

奈特在爱荷华大学的最后几年里开始广泛阅读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著作和德国历史经济学的其他传统著作。1927

年，他翻译和出版了韦伯的《经济通史》(*General Economic History*)，这是韦伯的著作第一次被译成英文出版。不久之后，他写出了对韦尔纳·松巴特(Werner Sombart)的《高级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的长篇书评(第6章)。从《高级资本主义》的书评中我们不难发现，奈特对韦伯的尊重是显而易见的，他批判松巴特只因为其没有追随韦伯。奈特认为：“在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研究中，只有韦伯采取了广泛的历史比较视角；只有他采取的角度能够真正为此类问题提供一个答案。”(143)。

当奈特于1928年重回芝加哥大学时，他的兴趣似乎转向了比较经济史学和社会学。为了在经济学中采取多元主义方法，把传统经济理论和与历史和社会制度的作用结合起来，奈特开始教授经济思想史，并给研究生开设了历史/制度经济学课程。1930年，他用古根海姆研究基金(Guggenheim Fellowship)到德国和奥地利旅行，并在维也纳做了题目为“Ist wertfreie Nationalökonomie möglich?”的讲座。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一直开设经济制度史的研讨课程，其中包括广泛阅读韦伯的著作。1935年，他发表了新制度主义的第一个扩展版本——“经济理论与国家主义(Economic Theory and Nationalism)”(奈特, 1935b)。

虽然奈特在芝加哥大学创建新制度主义的计划因他参与并塑造的芝加哥学派(经济)(有关经济学理论化)而耽搁了，但韦伯和历史经济学对奈特的影响在他其后的著作中是显然易见的。在本文集中，有四处体现了这种影响。第一处是奈特关于宗教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这一“韦伯论题(Weber thesis)”的思考，宗教问题甚至成为他终生的研究兴趣。在评论松巴特时，奈特总结了关于“韦伯论题”的文献，赞同布伦塔诺(Lujo Brentano)的关于战争与贸易的关系比新教徒与贸易的关系更能解释资本主义起源的观点。不过，他并没有忽视宗教

与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经济学和伦理学”(第二卷,第2章)中有针对基督教伦理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作用的强烈批判:“在社会行动问题上,求助于基督教或道德说教,很有可能带来的是坏的而非好的结果。”20世纪40年代他与梅里厄姆(Merriam)合著的《经济秩序与宗教》(*The Economic Order and Religion*)(奈特和梅里厄姆,1945)进一步扩展了他对宗教与经济组织之间关系的负面评价。他写了一系列关于宗教和经济学的文章和书评,本文集收录了有代表性的两篇。其中,“人类权利和自然法则”(第二卷,第7章)使用雅克·马利坦(Jacques Maritain)的著作作为对比,并在文中一再强调他反对在现代社会政策的决策中求助宗教传统的哲学立场。不过,本文集收集的另一篇代表性文章“西方哲学和社会制度”(第二卷,第14章)则扩展了他对基督教与市场社会之间的历史关系的思考,比较了市场与以西方宗教传统为基础的宗教文化之间的可能联系。

第二,韦伯的影响还体现在奈特重新思考了经济学方法。他的最早期著作是赞成J.S.穆勒的“逐步近似”方法的。在《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和“局限性”一文中,他把这一方法当作“科学方法”加以辩护。然而,1930年,出于对韦伯的“理想形式(ideal types)”和“解释社会学(*Verstehen*)”的欣赏,奈特的方法论立场开始建立在现实世界与理想化经济理论世界的彻底分离上。在理想化的经济理论世界中,类似于古典力学的新古典经济学静态分析是适用的。不过,正如他在“静力学和动力学”(第7章)中论述的那样,我们无法从那个理想世界一步步来到现实世界,原因是,在现实世界中,理论中“给定的要素”——人的需求、资源和技术等——都是不停地变化的,而这个变化过程只能由历史而非机械解释。这个主题在1940年发表的“经济学的‘真理’”(第14章)的扩展版书评中再次体现出来。尽管“真理”一文更多地因其对实证主义的猛烈拒绝而著称,但这篇文章仍很好地解释了“解释社会学

xv (Verstehen)”在经济学中的地位，表现出奈特的新历史方法论 (new historical methodology)。我们可以在他此后的文章中看到该方法论立场对他写作的影响，例如，“需求理论的现实性和关联性”（第二卷，第8章）和“工资问题的经济和伦理研究”（第二卷，第11章）。

第三，我们能够在“对历史的经济解释的几点注释”（第二卷，第5章）中看到韦伯对奈特的影响。奈特最初是在1935年的美国历史协会年会上评论马克思主义者和来自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 (Charles Beard) 的经济解释的。被《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拒绝发表的这些评论，最终在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的支持下陆续发表。

最后，应当指出的是，奈特1941年发表的“人类学与经济学”（第二卷，第3章）反映出他对韦伯的比较经济社会学 (comparative economic sociology) 的持续兴趣。这篇文章是对梅尔维尔·郝斯科维茨 (Melville Herskovits) 的《原始人的经济生活》(The Economic Life of Primitive People) 的评论，它结合了奈特对“理想形式”分析方法的欣赏和对不同社会形态下经济组织形式比较的兴趣。他同意郝斯科维茨关于“市场与非市场社会之间存在合理区别”的论点，但不同意郝斯科维茨的如下论点：作为科学家的经济学家应当放弃对理想化市场运行原理的研究，而将精力投入到对具体文化背景下的市场的详细研究。奈特对“经济理论是一门科学”这一论点的捍卫使读者想起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对制度主义的批判。

然而，奈特在芝加哥大学任职期间的伟业并不是发展了的韦伯式制度经济学，而是由于建立了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基本论点“价格理论”和“祛魅”的自由主义而被人铭记。这种“祛魅”的自由主义是在拒绝放弃自由主义核心教义的同时，承认现代社会的自我矛盾。

奈特对芝加哥学派价格理论的核心作用是，通过对若干前

沿问题的研究，对经济学的基本概念进行了重新构思。他关于效用和成本的著名笔记（1935c），最初来源于20世纪30年代在芝加哥经济学课程上的部分讲稿，并最终收录在《经济组织》（1951）中，反映了他对经济学基本概念的深思。几乎在同一时期，他发表了一套关于资本理论的笔记，命名为“资本主义生产、时间和收益率”（第9章）。值得关注的是，该本笔记对奥地利学派资本理论的严厉批判成功引起了几位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的回应和关于奥地利学派理论优缺点的激烈交锋。“资本数量和利率”（第12章）也是奈特在这场论战中的学术成果，这篇文章试图系统性地阐述奈特对资本理论的新理解。但和奈特其他文章一样，对理论难点的探索和深刻批判才是这篇文章的重心——读完这篇文章后，我们甚至困惑到底能不能画出资本供求曲线。 xvi

对经济思想史的研究是奈特重新构架经济理论基本概念的另一重点。为了充实自己在芝加哥大学开设的经济思想史课程，奈特邀请了维纳（Viner）和奥斯卡·兰格（Oskar Lange），与自己共同教授这门课程。奈特在该课程上的前提论点是：“经济学对‘过去’理论的主要兴趣表现在比较‘过去经典理论体系’与‘当下正确理论观点’的异同，并从‘过去’理论的错误中学习经验”（237）。奈特的课程使学生有机会通过批判古典生产和分配理论来弄清楚新的成本理论。“李嘉图生产和分配理论”（第11章）展示了奈特经济思想史课程的核心主题，也是芝加哥价格理论建立的历史视角。

资本理论并非是奈特在重新构架经济理论时引发的唯一论战。因为他的新经济理论框架既完全不同于古典理论，也完全不同于其他新方法，特别是希克斯（J.R.Hicks）、凯恩斯（J.M.Keynes）和亨利·舒尔茨（Henry Schultz）在其著作中建立的新方法。所以奈特必然要对这些方法作出回应，于是有了“静力学和动力学”、“商业周期、利息和货币：方法论方法”（第

二卷，第4章）、“需求理论的现实性和关联性”（第二卷，第8章）和“失业：凯恩斯先生的经济理论革命”（本卷第13章）等。这些文章都是对其他新经济学方法的批判，且皆基于奈特方法论中的独特之处——不允许将研究建立在潜在理论假设之外的假设上。例如，“需求理论的现实性和关联性”一文调查研究了舒尔茨对作为需求理论基础的瓦尔拉斯原理的实证检验，还研究了希克斯对凯恩斯货币理论与斯拉斯基效用分析的结合。奈特指出这两个研究的不足之处均是他们过分追求了科学的“现实主义”，导致不可接受的假设条件的产生，而这些假设严重侵蚀了传统需求理论的有限关联性。奈特对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书评非常有名，代表着芝加哥经济学派对凯恩斯理论的重要回应。“商业周期、利息和货币”一文结合了对希克斯发展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评论，是奈特在发展芝加哥货币理论时唯一出版的学术成果。

当我们阅读这些经济论文时，容易忘记奈特对经济理论的重新构架最初是在课堂上，或与同事争论的过程中产生的，而不是通过出版物阐述的。因此，除了它们的内在质量，这些文章还很好地说明了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间，芝加哥经济学派形成阶段的经济分析风格。其中，以理论严谨著称的奈特、维纳和兰格共同执教芝加哥经济理论和经济思想史的核心课程。他们时常有着不同的结论——奈特和维纳有不同的成本理论观点；奈特和兰格在资本和利息问题上有争议。这种理论探索型的学术氛围令学生十分兴奋——兴许他们能在老师的理论里发现漏洞，甚至加以改善！奈特和维纳的反凯恩斯立场得到了亨利·西蒙（Henry Simons）和劳埃德·名茨（Lloyd Mints）的声援，并一起提出了一个引人注目的替代方法——这个方法不仅仅是对传统理论的辩护，更鼓励学生们自主建立独立发展的经济学理论——货币理论的发展就体现了这一点。芝加哥经济学派，即战后出自芝加哥大学经济系的一大批知名经济学家和理

论，对战后的经济思想和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20 世纪 30 年代至 40 年代，奈特加入的芝加哥大学的教育哲学和改革论战，提醒人们经常被忽视的关于他参与的芝加哥学派与他的社会型哲学之间的联系。由于奈特在芝加哥大学任教的时期恰好是罗伯特·哈金斯（Robert Hutchins）担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时期（1929—1951 年），在这 20 年间，奈特参与了关于“什么样的教育最能使年轻人应对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和复杂性？”的校园论战。奈特与芝加哥大学多数自然和社会科学家一齐反对哈金斯和他从耶鲁大学带过来的莫蒂默·阿德勒（Mortimer Adler）推出的各种计划。哈金斯和阿德勒试图通过各种措施建立围绕西方名著和西方哲学中的不朽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本科教育。但大多数芝加哥大学教师想要保持芝加哥大学的“进步时代”（Progressive Era）教育理念：教育的重点是通过科学使知识胜过无知。在他们心目中，学生们需要学习的是新时代的“经典（classics）”——当代最优秀的科学和社会研究——而不是研读充斥着过时研究方法和错误思想的古代“经典”。同时，教师们很高兴看到哈金斯任校长期间新设的学部 and 学院之间有了更清晰的区分。学系（department）不再负责普通教育（学院的责任），而是集中精力培养本学科方面的专家。这种教学方法上的重新安排为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发展作出了显著贡献（Emmett, in press）。因此，在芝加哥大学待过的人无一不受到 20 世纪 30 年代到 40 年代间的这场教育论战的影响。比如，它大大影响了奈特关于自由主义的思考，以及他在其他论战中的风格。

xviii

本文集的第 10 章包含了两篇反映奈特在芝加哥大学论战中态度的短文。“现代思潮：它是反智主义的吗？”写于论战高峰的 1934 年春夏之交。这篇文章最初是为《栗色日报》（*Daily Maroon*）写的，但遭到了支持阿德勒的编辑拒绝，最终以校内油印杂志形式发表。然而，芝加哥大学的师生们在更早的时



候就看到了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写成后，哈里·吉蒂昂尼（Harry Gideonese）就把它放进他所教的大学二年级社会学课程的阅读材料里了，并作为阅读材料延续了好几年。这篇文章因此成为教师们为现代性（modernity）进行辩护的重要组成部分。第10章里的另一篇短文，“上帝、阿德勒教授和逻辑”是对阿德勒1940年“上帝和教授”的著名演讲的回应。《栗色日报》收集了几所大学不同教授对该演讲的回应，并于1940年11月集中为作为专刊发表，且在全美广泛发行。总的来说，这些短文让我们了解了奈特作为一个多学科学者，在20世纪30年代间最主要的学术行为。

在20世纪20年代与制度主义者的论战中和对比较历史经济学的研究中，奈特已对“祛魅”的自由主义（disenchantment liberation）有过涉足。不过，这一“祛魅”显见于：1. 他看衰大萧条时期政府调控的作用和欧洲法西斯主义和专制政府的兴起；2. 他暗示正确的信念（right-mindedness）比哈金斯和阿德勒等新中古主义者恪守的自由更重要。在题为“共产主义的理由：一个前自由主义者的观点”（直到1991年才出版）的讲稿中，奈特展现了他对自由主义自我矛盾的本质及其必然被替代的命运的沉思。20世纪40年代，他逐渐转变成了不仅为自由主义的核心原则进行辩护，也对“科学至上论（scientism）”和自由主义改革运动中的“道德主义（moralism）”进行攻击。从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奈特在几十次演讲中重复这种观点，但他也对其他维护自由主义的文章和论点进行批判。

奈特的“祛魅”自由主义（disenchantment liberation）的核心是他对自由主义自我矛盾的本质的认知。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尊重个体差异化的价值观和承诺寻求真理和正义的基础上的；对于以“组织是否能有效满足给定需求”为主要问题的社会来说，自由主义是好的。但是，奈特认为，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是关于“我们应当需要什么”和“什么准则可以用来处理相互关